

“太可怕了”：托儿所虐待儿童案件令澳大利亚父母恐慌

2025年8月7日

分享 ↵ 节省 ⏸

拉娜·拉姆

BBC新闻，悉尼



盖蒂图片社

近年来，托幼行业发展迅速。

本·布拉德肖每周两次将年幼的儿子送到悉尼的一家托儿中心，然后去上班。

和澳大利亚成千上万的家长和监护人一样，这位 40 岁的家长一直坚信，工作人员会以他孩子的最大利益为重。

但这位有两个孩子的父亲表示，近几个月来，在澳大利亚各地托儿中心发生多起备受瞩目的性虐待和身体虐待指控事件后，人们对托儿系统的信任已经“遭到削弱”。

“就像那句关于蟑螂的老话——如果你在家里看到一只，还有十只你看不见。这些看不见的蟑螂更容易被抓到。那些你看不见的蟑螂更可怕，”他告诉BBC。

过去几周，维多利亚州有 2000 名儿童被敦促接受传染病检测，此前一名托儿所工作人员被控大规模性侵婴儿；警方公布了一名悉尼男子的姓名，该男子曾在 60 家课后托管机构工作，并被控拍摄其监管下的儿童的“露骨”照片；昆士兰州一名女子因涉嫌虐待一名一岁男童而出庭受审；另有两名悉尼工作人员因一名幼儿身上布满瘀伤而被起诉。

就在全澳上下仍在为幼教工作者阿什利·保罗·格里菲斯（Ashley Paul Griffith）的罪行感到震惊之际——他被誉为“澳大利亚最恶劣的恋童癖者之一”——去年年底，他因强奸和性虐待近 70 名女孩而被判处终身监禁。

这一系列指控引发了家长们的恐慌和恐惧，儿童安全倡导者要求采取行动，修复他们所称的危险的无能系统，政界人士也承诺进行改革，以保障澳大利亚最弱势群体的安全。

“有些托儿中心仍然安全，但目前的托儿体系绝对没有起到保护儿童或优先考虑儿童安全的作用，”儿童保护倡导者海蒂·约翰斯顿说道。

“它每一步都失败了。”

快速增长，风险更大

近年来，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动让更多儿童获得早期儿童教育和保育服务，研究表明，这具有许多积极的长期影响。

联邦和州政府已向该行业投入数百万美元，其中包括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三天托儿服务的资金。



莉亚·布罗姆菲尔德是呼吁加强该行业监管的人士之一。

这些措施促进了该行业的快速发展，大量新中心涌现，加剧了合格员工的短缺。

澳大利亚儿童保护中心主任莉亚·布罗姆菲尔德教授表示，这种增长导致了“严重的脆弱性”。

“任何事物发展得如此迅速，都会伴随着风险，”她说道，并列举了缺乏监管和监督、管理人员培训有限以及劳动力分散和随意等问题。

“把所有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从犯罪分子的角度来看，你就建立了一个薄弱的系统.....一个更容易渗透的系统。”

在墨尔本儿童性虐待案发生后，约书亚·戴尔·布朗被控对八名婴儿实施 70 项虐待，联邦政府赋予自己更大的权力，可以取消违反质量和安全标准的机构的资金。

联邦教育部长杰森·克莱尔表示，这项措施并非旨在“关闭教育中心”，而是为了加大压力，促使教育中心“提高标准”。

但布拉德肖先生想要更多。他说，取消对某个中心的资助“并不能阻止犯罪，只是惩罚犯罪而已”。

“你必须采取积极主动的行动。”

营造安全空间

近期一系列涉嫌犯罪事件引发了全国范围内关于如何更好地保护儿童的热烈讨论。限制男性参与育儿是其中最具争议的建议之一。

公众呼吁禁止男性从事某些工作，例如换尿布和带孩子上厕所——尽管有人警告说，这可能会给女性员工带来额外的压力。

“这不是要禁止男性教师，而是要让家庭拥有自主权和知情选择权，”儿童虐待幸存者权益倡导者路易丝·埃德蒙兹说道。

布朗的案例促使他所在托儿中心的母公司G8教育集团推出所谓的“私密护理豁免条款”，让家长 and 监护人有机会选择由谁来承担私密和敏感的护理工作。该公司还承诺在其所有托儿中心安装闭路电视监控系统。



约书亚·戴尔·布朗面临70项虐待指控，涉及8名婴儿。

约翰斯顿女士是儿童保护组织“勇敢的心”的创始人，她说这些都是自然反应，但她也警告说，虽然“男性肯定面临更高的风险”，但女性也会虐待儿童，而且犯罪者可以在各种环境下实施虐待。

“他们伺机而动……当其他人注意力不集中、心不在焉、自满、漠不关心或过于轻信他人时，他们就为犯罪分子创造了‘机会’。”

中心可以采取的其他切实可行的措施来提高儿童安全，包括始终安排两名教育工作者直接观察儿童，以及消除中心的盲区——用玻璃窗代替实心门，拆除没有窗户的墙壁，并安装更多的镜子以进行“偶然监督”。

约翰斯顿女士说：“这一切都是为了减少捕食者在隐蔽的角落或缝隙中躲藏或隔离的机会。”

隐藏在众目睽睽之下

但专家表示，大规模的系统改革也早已迫在眉睫。

2017年，一项历时数年的皇家委员会对教会、学校和托儿所等机构中的儿童性虐待问题进行了调查，并提出了 400 多项建议。但批评人士表示，在一些最重要的改革方面，进展已经停滞不前。

其中一项重要的建议是，澳大利亚各州总检察长将在本月的一次会议上讨论，那就是彻底改革澳大利亚对与儿童一起工作的人员的审查制度。

目前，各州和领地都会对与儿童接触的人员进行类似于警方背景调查的审查，但彼此之间并不共享这些信息。倡导者呼吁建立全国统一的系统，但也有人认为，目前的审查力度还不够。

埃德蒙兹女士说：“这种做法前后矛盾，过于依赖先前的定罪记录。”

例如，许多人表示，该系统应该捕捉到一些危险信号，例如正式投诉、工作场所警告、警方情报，以及在皇家委员会成立后设立的国家赔偿计划的保密申请中被认定为涉嫌虐待者的人员。

专家认为，扩大调查范围至关重要，因为虐童指控在法庭上很难站得住脚。证人往往是年幼的儿童，他们要么不会说话，要么词汇量有限，记忆力可能较差，而且常常缺乏对情境的理解。

约翰斯顿女士说：“要当场抓住某人作案，并能毫无合理怀疑地证明其罪行，几乎是不可能的。”



儿童虐待指控可能很难证实。

正因如此，布罗姆菲尔德教授和其他一些人呼吁建立全国性的幼教行业注册制度——就像医生或教师的注册制度一样。该制度将要求从业人员证明其资质，提供详细的工作经历，并要求所有从业人员遵守统一的行为准则。

支持者认为，该系统还可以涵盖目前儿童工作审查无法涵盖的许多内容。

“在儿童性虐待案件中，当你回顾往事时，你会发现很多很多危险信号，”布罗姆菲尔德教授说。

“或许存在某种模式，但（目前）我们还没有发现，因为他们在不同州、不同行业或不同服务提供商之间流动。”

布拉德肖先生表示，如果能获得更多关于教职员的信息，将有助于像他一样的家长做出明智的决定。

他解释说，托儿服务对他的家庭来说是必需的，因为他自己全职工作，而他的妻子是一名高中教师，每周工作四天。

但通常情况下，除了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墙上的照片”之外，关于托儿中心员工的细节信息很少，因此家长们往往不得不“凭感觉”来评估托儿机构。

“这有点像个黑匣子，你被束缚住了，因为你需要把孩子送去托儿所，这样你才能支付在大城市的生活费用。”

布罗姆菲尔德教授表示，这也需要加强对家长的教育，让他们知道该问什么问题，以及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如何发现性侵儿童的迹象。

建议包括询问服务提供商的儿童安全政策、员工流动情况以及评估物理空间是否存在任何视线问题。



托儿中心的开放空间有助于预防不当行为。

专家表示，该行业管理人员还需要接受更好、更定期的培训，学习如何预防和识别问题行为或模式。

对于布罗姆菲尔德教授（她曾是负责调查儿童性虐待的皇家委员会团队成员之一）来说，这些对话她已经进行了十多年。

但她希望当前的危机能够促使澳大利亚采取更强有力的行动。

布罗姆菲尔德教授说：“或许其中一件将会发生的事是，人们会有更有政治意愿将儿童安全放在首位。”

“我们从中得到的最重要的教训是，在儿童安全问题上，我们永远不能掉以轻心。”

“犯罪分子越来越狡猾，总能找到绕过我们现有制度的方法。我们不能忘记过去的教训……也不能以为这个问题已经消失了。”